

ZHUXI YU ZHONGGUOWENHUA
WUYISHAN
ZHUXI YANJIUZHONGXIN BIAN
XUELIN CHUBANSHE

朱熹与中国文化

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编

学林出版社

朱熹与中国文化

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 编

学林出版社

特约编辑：张志哲

封面设计：范娇青

朱熹与中国文化 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 编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定西路710弄37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丹阳第二彩印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25 插页 5 字数 269,000

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ISBN 7-80510-307-0/G·61

定价 5.55元

编辑说明

朱熹，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祖籍安徽婺源（今属江西），定居建阳（今福建建阳）。生于宋高宗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农历九月十五日，卒于宋宁宗庆元六年（公元1200年）三月九日。葬于建阳唐石理大林谷（今黄坑乡后塘村）。

朱熹5岁入学。18岁贡于乡。次年（宋高宗绍兴十八年，公元1148年）中进士第，任泉州同安主簿。后罢归。从延平李侗学。李侗之师为罗从彦，罗从彦之师为杨时。而杨时则是二程的及门弟子。二程的理学，朱熹是经过李侗继承下来的。

在朱熹的71年生涯中，为官9年，余年大都是著书立说，讲学论道。据统计，朱熹的著作有70余部凡460多卷。创办书院27所，门生达几千人。主要著作有：《四书集注》、《诗集传》、《楚辞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通鉴纲目》等。朱熹门人辑录有《朱子语类》140卷。清人李光第编有《朱子大全》100卷。

孔子集前古思想文化之大成，开儒学。北宋兴理学，儒学得以继续发展。朱熹崛起于南宋，集北宋以来理学和孔子以下思想文化之大成。朱子与孔子，是儒家文化的主要代表。“春秋有孔子，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闽北是朱熹故里和朱子学的发祥地。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的成立，对于励志改革，反思传统，深入研究朱熹，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中外文化

交流，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为了促进朱熹及朱子学的研讨活动，我受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理事会的委托，在秘书长杨青精心设计下，选编这一本《朱熹与中国文化》。本文集的内容，大致分成三部分：一是朱熹的学术探讨，侧重宏观；二是朱熹的行迹评述，侧重微观；三是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成立大会的主要纪实。选编的文章，基本上来自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的论文，有几篇录自己出版的书刊，也有是约请专家写的。凡入选的文章，本着文责自负的原则，一律不作改动。

在本书的编辑整理过程中，还曾得到学林出版社社长雷群明先生的大力支持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副编审王有为先生的热情相助，仅此一并致谢！

张志哲

1989年元旦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目 录

编辑说明	(1)
理学内容的特质	周谷城 (1)
朱子矗立中道	钱 穆 (4)
朱熹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冯友兰 (6)
朱熹之经学	周予同 (8)
应当把宋学和理学加以区别	邓广铭 (25)
朱子学研究的新方向	蔡尚思 (28)
攀登朱熹研究的新高度	邹永贤 (33)
朱子对沈括科学学说的钻研与发展	胡道静 (39)
朱熹诗文理论述要	黄寿祺 张善文 (46)
朱熹与传统文化	陈正夫 何植靖 (52)
闽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作用	高令印 (60)
从文化角度重估朱熹及朱子学	王有为 (71)
论理学家的幸福观	张志哲 (73)
儒学发展简论	张玉奇 (88)
论朱熹的“格物致知”认识论和方法论	曾乐山 (103)
重评朱熹的历史观	潘富恩 (114)
一论朱熹的政治主张	牛瑞熙 (128)
学术史的尝试之作	
——论朱熹《伊洛渊源录》	邓子美 (148)

朱熹学术在闽北产生的条件	蒋仁	余奎元	(154)
朱熹与武夷山	陈其芳		(163)
朱熹在同安	颜立水		(179)
试析朱熹在南平西林院的题诗	林蔚起		(186)
朱熹与福建书院考评	黄金钟		(191)
朱熹讲学考亭	陈明考		(197)
朱熹在淳安事迹考略	孙平	方才	(208)
朱熹兴复白鹿洞书院史事考	李才栋		(221)
朱熹在湖南	杨金鑫		(236)
朱子学在日本	王守华		(248)
朱熹与南剑三先生	何乃川		(258)
从《四书集注》看朱熹与杨时	黎昕		(264)
朱熹与辛弃疾	李加林		(278)
韩愈·朱熹·戴震	刘鄂培		(282)
筼筜铺查访记	吴更		(294)
福建闽学研究评述	黄保万		(299)

发掘闽学资源，振兴武夷文化

——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成立大会开幕词	刘钦锐	(309)
欢迎各地贤哲，戮力开发武夷文化宝库		
——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成立大会闭幕词	朱荣元	(313)
“道南理窟”谱新篇		
——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		
成立大会纪要	励冰	(315)
宏扬闽学，振兴中华		
——论建立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的意义	杨青	(323)
贺电贺信摘登		
中国孔子基金会贺词		(334)

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张岱年贺信	(334)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贺麟贺信	(335)
湖南省中国哲学史研究会、船山学社贺信	(335)
杭州大学校长沈善洪贺信	(336)
福建中华诗词学会贺信	(336)
《中国哲学史研究》编辑部贺信	(336)
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成立大会通过的三项决议及 致台湾学者函	(338)
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章程	(343)
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领导机构成员名单	(346)
筹集朱熹研究基金缘起	(349)
武夷山朱熹研究基金会简章	(351)
跋	张岱年 (353)

理学内容的特质

周 谷 城

理学盛行时代正在北宋初至清初。这时代也正是统一帝国及专制主义发展到极度的时代。统一帝国及专制主义需要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思想，理学正是这种思想。

理学最重要的内容或唯一无二的内容厥为超于现实的抽象之理。现实为具体的事物，理为抽象的概念。现实为形而下之器，理为形而上之道。朱熹云：“凡有形有象者即器也，所以为是器之理则道也。”（《与陆子静书·文集》卷三十六）“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语类》卷九十五）例如我们眼见的五官四肢具备的人，便是一有情有状之器；至于作人的一切道理，却只能诉诸思维，而不是我们的眼所能见的，那便是无形无影之理。人类如此，即其他无生之物，亦莫不然。例如舟车，是我们眼所能见的，可以说是有形之器；至于舟只可行于水，车只可行于陆的这种必然性，却只能诉诸思维，那便是无形之理。比较说来，理或抽象的概念是诉诸思维的，器或具体的事物是诉诸感官的。其大略的分别约如此。这种分别是随文化的发展，人智的进步，而日益明显的，并没有什么不合理。

讲到理的根据，历来有两种极端相反的见解。一则谓理或抽象的概念为先存的：没有具体事物之时，已有抽象的道理存在着；没有人类之时，已有人类之所以为人类的理由存在着。这一说可称之为迹先的(*a priori*)。另一则谓理或抽象的概念为后起

的：因已有了许多具体事物，于诸事物之中可以归纳出一个抽象的道理；人类之所以为人类的道理，便是从人类的生存上归纳出来的，并非先人类而存在着。这一说可称之为迹后的(a posteriori)。同是诉诸思维之理，一则谓是先具体事物而存在之现成的东西，一则谓是从具体事物中归纳出来的结果。前者实为不可思议，后者却极近人情。理学家之所谓理类于前者，与柏拉图之所谓观念极相似。朱熹云：

无极而太极，不是说有个物事光辉辉地在那里。只是说当初皆无一物，只有此理而已。……惟其理有许多，故物有许多。（《语类》卷九十四）

做出那事，便是这里有那理。凡天地生出那物，便是那里有那理。（《语类》卷一百一）

未有这事，先有这理。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语类》卷九十五）

若在理上看，则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尝实有是物也。（《文集》卷四十六《答刘叔文》）

问：天地未判时，下面许多都已有否？曰：只是都有此理。天地生物千万年，古今只不离许多物。（《语类》卷一）理在物先，其说大抵如此。至于宇宙间的事事物物，千差万别，是否每一物事有一物事之理？理学家的答覆为正面的，承认每一物事有其独特之理。朱熹云：

问：理是人物同得于天者，如物之无情者亦有理否？曰：固是有理。如舟只可行之于水，车只可行之于陆。（《语类》卷四）

问：枯槁之物亦有性，是如何？曰：是他合下有此理。故曰：天下无性外之物。因行阶云：阶砖便有砖之理。因坐云：竹椅便有竹椅之理。（《语类》卷四）

事事物物固然各有其独特之理。但宇宙间的事事物物并非彼此

孤立，实统于一个全体的宇宙。然则全体的宇宙是否有一个终极之理呢？理学家的答覆仍是正面的；承认宇宙有一个终极之理。朱熹于此终极之理，尝袭用周敦颐所用之名，名之曰太极。与此终极之理或太极相对的具体事物，不论形象如何，概称之为气。

事事物物皆有个极，是道理极至。蒋元进曰：如君之仁，臣之敬，便是极。先生曰：此是一事一物之极。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太极本无此名，只是个表德。（《语类》卷九十四）

太极只是个极好至善的道理。……周子所谓太极，是天地人物万善至好的表德。（《语类》卷九十四）

（本文系《中国通史》第三篇第九章
第一节，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朱子矗立中道

钱 穆

拙著朱子新学案，分篇逾五十，全书超百万言，恐读者畏其繁猥，作此提纲，冠于书端，庶使进窥全书，易于寻究。

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孔子集前古学术思想之大成，开创儒学，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中一主要骨干。北宋理学兴起，乃儒学之重光。朱子崛起南宋，不仅能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并亦可谓其乃集孔子以下学术思想之大成。此两人，先后矗立，皆能汇纳群流，归之一趋。自有朱子，而后孔子以下之儒学，乃重获新生机，发挥新精神，直迄于今。

然儒学亦仅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主干，除儒学外，尚有百家众流，其崇孔尊孔，述朱阐朱者可勿论，其他百家众流，莫不欲自辟蹊径，另启途辙，而孔子朱子矗立中道，乃成为其他百家众流所共同批评之对象与共抨击之目标。故此两人，实不仅为儒学传统之中心，乃亦为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正反两面所共同集向之中心。不仅治儒学者，必先注意此两人，即治其他百家众流之学，亦必注意此两人，乃能如网在纲，如裘在领。不仅正反之兼尽，亦得全体之通贯。

孔子年代，距今已远，其成学经过，已难详索。后之崇孔尊孔者，亦惟以高山仰止之情，发为天纵大圣之叹而止。朱子距今仅

逾八百年，书籍文字可资稽考者尚多，凡朱子之所以为朱子，其成学之经过，实可按图索骥，分年历述。故治朱子之学，比较可以具体而详尽，并亦有据而可证。学者潜心于此，可识儒学进修之阶梯，虽不能举一以概全，要之是典型之尚在，其所裨益，决非浅小。

孔子以来两千五百年，述之阐之者既多，反之攻之者亦众，事久而论定，故孔子之学，乃虽远而益彰。朱子距今仅八百年，后人之阐发容未能尽。而反朱攻朱者，多不出于百家众流，而转多出于儒学之同门。盖自有朱子，而儒学益臻光昌。自有朱子，而儒学几成独尊。于是于儒学中与朱子持异见者乃日起而无穷。群言淆乱，所争益微，剖解益难。故居今日而言朱子学，尚有使人不易骤获定论之憾。尊孔崇孔，乃朱子以后中国学术上一大趋向，而述朱阐朱，则尚是中国学术上一大争议。然诤朱攻朱，其说亦全从朱子中来。今果于朱子原书，能悉心寻求，详加发明，先泯门户之见，而务以发现真相为主。逮于真相既白，则述朱阐朱之与诤朱攻朱，正反双方，宜可得一折衷，由是乃可有渐得定论之望。此则不仅为治中国八百年之学术思想史者一重大课题，实亦为治中国两千年来之儒学史者一重大课题。凡属关心中国文化大传统中此一主要骨干之精神所在，大旨所寄者，对于此一课题，皆当注意。作而不揣谫陋，发愤为此书，其主要意义亦在此。

（本文系《朱子新学案·朱子学提纲》第一部分，
巴蜀书社 1986 年版。标题是编者加的。）

朱熹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冯友兰

朱熹，或称朱子，是一位精思、明辩、博学、多产的哲学家。光是他的语录就有 140 卷。到了朱熹，程朱学派或理学的系统才达到顶峰。这个学派的统治，虽然有几个时期遭到非议，特别是遭到陆王学派和清代某些学者的非议，但是它仍然是最有影响的唯一的哲学系统，直到近几十年西方哲学传入之前仍然如此。

我说过，中国皇朝的政府，通过考试制度来保证官方意识形态的统治。参加国家考试的人，写文章都必须根据儒家经典的官版章句和注释。我又说过，唐太宗有一个重大行动，就是钦定经典的官版章句和“正义”。在宋朝，大政治家和改革家王安石（1021～1086）写了几部经典的“新义”，宋神宗于 1075 年以命令颁行，作为官方解释。不久，王安石的政敌控制了政府，这道命令就作废了。

送里再提一下，新儒家认为《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是最重要的课本，将它们编在一起，合称“四书”。朱熹为“四书”作注，他认为这是他的最重要的著作。据说，甚至在他去世的前一天，他还在修改他的注。他还作了《周易本义》、《诗集传》。元仁宗于 1313 年发布命令，以“四书”为国家考试的主课，以朱注为官方解释。朱熹对其他经典的解释，也受到政府同样的认可，凡是希望博得一第的人，都必须遵照朱注来解释这些经典。明、清两朝继续采取这种作法，直到 1905 年废科举、兴学校为止。

儒家在汉朝获得统治地位，主要原因之一是儒家成功地将精深的思想与渊博的学识结合起来。朱熹就是儒家这两个方面的杰出代表。他的渊博的学识，使他成为著名的学者；他的精深的思想，使他成为第一流哲学家。尔后数百年中，他在中国思想界占统治地位，决不是偶然的。

（本文系《中国哲学简史》第二十五章，北京
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标题为编者所加。）

朱熹之经学

周予同

兹依经古文学所主张之六经次第，略述朱熹之经学如次。

(一) 易经学

就哲学言，朱熹为程颐之继承者，故治思想史者每以程、朱并称；顾就经学之《易》学言，则程、朱不无疑派之嫌，此学者所当注意也。欲明其故，请先述《易》学之变迁。

《易》之为书，推天道以论人事，因学者着眼轻重之不同，而有象数义理二派之分。大概夸诞者喜言天道，而言天道者偏于象数；实践者好述人事，而述人事者趋于义理，此势之必然也。程、朱之《易》学，虽均属与汉《易》对峙之宋《易》，然程为宋《易》中之理派，而朱则为宋《易》中之象数派，二人之立场固自不同。《四库总目提要》经部《易》类小序云：“《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房)焦(赣)，入于襃祥，再变而为陈(抟)邵(雍)，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颐)，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所谓汉儒，所谓京、焦，所谓陈、邵，虽汉宋之不同，然均属象数一派；所谓王弼，所谓胡、程，所谓李、杨，虽虚实之各异，然均属于义理一

派。朱熹之《易》，喜言太极无极，先天后天，其继承陈抟、邵雍象数之学，无可讳言。在熹之本意，或以为程颐《易传》偏于义理，故济以象数，以维持其哲学上之调和统一的态度，殊不知学术上有绝不能调和统一者，于是程、朱之《易》学陷于敌派之嫌，此实非朱熹初意所及料也。

上所陈述，或尚嫌简略，兹再申言之。按《易》学，就内容言，固可分为象数、义理二派，但就学统言，又可分为汉《易》、宋《易》二派。汉《易》盛于两汉，复分为今文《易》与古文《易》二派，今文《易》偏重象数，在西汉时，有施氏、孟氏、梁丘氏、京氏立于学官。其学后均亡佚，唯三国时之虞翻传孟氏之《易》尚略可考见。古文《易》始于费氏，数传而得郑玄，时言爻辰，盖亦不废象数，及晋王弼，复杂以《老》、《庄》之言，始专言义理。宋《易》起于两宋，复分为图书与义理二派。图书之学，亦言象数，其初出于方士陈抟。抟得道家修炼之图，因创为太极、无极、河图、洛书、先天、后天等说；周敦颐用其说而稍变易之，著《太极图说》。邵雍精于数，又稍变易之，著《皇极经世书》，当时言《易》学者多宗之。义理一派，以程颐《易传》为著。程子与邵雍同时，又属懿戚，然不肯从受数学，其著《易传》，专言义理，不及象数。其《序》云：“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备于辞。推辞考卦，可以知变，象占在其中矣。”其《答张问中书》云：“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易》因象以知数；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矣。必欲穷象之隐微，尽数之毫忽，乃寻流逐末，术家所尚，非儒者之务也。”则其反对象数图书之学，昭然若揭矣。

就经学言，汉代之今文《易》为《易》之正传；就哲理言，汉、宋之义理派为《易》之大道；至宋代图书之学，无论就何方面言，皆绝无稳定之立场。乃朱熹作《周易本义》以补程《传》，谓程言理而未言数，遂于篇首冠以九图；又作《易学启蒙》，发明图书之义。其初盖欲调和程邵之间，以实现宋《易》之大一统；然不知已陷于